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中国周边外交战略新布局

中国已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宏大的『以我为主』的地缘经济战略布局。而正在努力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建构者和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中国将不再仅仅是国际经济体系及规则的参与者，

□ 陈积敏

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议题是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从本质上来说，中国外交战略体现并契合了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从周边外交战略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就和平议题而言，中国与周边大国之间的关系是重点考察对象；就发展议题来说，中国所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打造周边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路径。

主动作为，塑造总体有利的周边战略大环境

面对周边环境出现的新情况新机遇新挑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周边外交战略从顶层设计到政策实施到理念创新等方面都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第一，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与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从大战略设计的高度勾勒中国周边外交蓝图。2013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周边对我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时隔一年，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切实运筹好大国关系，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扩大同发展中大国的合作。切实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把我国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切实推进多边外交，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增加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外媒注意到，在讲话中，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的次序发生了变化，周边外交位列首位，凸显出中国政府对周边外交的重视。

第二，充分利用首脑外交与主场外交，展现出积极性与主动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于中国而言，周边国家的范畴已经突破了单纯的地缘层面，即不仅局限于与中国接壤或隔海相望等地理毗邻的国家，那些对于中国的安全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非毗邻域内国家也被囊括到中国周边的涵盖范围之列。换言之，是一种“大周边”的概念。据统计，在2014年里，习近平主席7次出访，有5次是访问周边国家。不仅中国领导人走出去，周边国家领导人也陆续来华访问，形成了高层互访的良好局面。

第三，重视周边外交理念的继承与创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周边环境。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倡导包容的思想，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

从周边外交理念的演变来看，中国从原来更多强调互惠到现在强调互惠的同时“更多惠及周边”，强调从全局着眼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提高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质量，“让利”将作为中国周边外交新常态，并促使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积极扮演经济发动机和公共品提供者的角色。

重视外交策略的运用，积极运筹周边大国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做好周边外交工作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也是外交工作的生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立以来高度重视外交策略的运用，紧紧抓住战略契机，对待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外交策略，有的放矢，针对性强，在运筹周边国家关系时把握大局，占据主动。

做好周边大国的工作，努力构建和平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对我国稳定周边、经略周边、塑造周边至关重要。大国对中国周边环境的生成负有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对我国周边环境具有重要影响的周边大国主要包括东部的日本、北部的俄罗斯与西部的印度。对于日本，中国坚持把原则性立场与灵活性策略结合起来，在中日关系处置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保持了战略主动性。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与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时尊重俄罗斯的战略关切，双方战略互信不断增进，中俄关系已成为大国构建和谐、建设性、平等信任、互利共赢关系的典范。中印领导人保持了密切互动，双方一致同意沿着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大方向，进一步构筑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两国在务实合作、分歧管控方面实现了新突破。总的来看，当前中国与周边大国之间的关系正在朝着积极有序方向发展。

构筑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地缘经济战略框架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立后，中国向国际社会推出一系列经济发展议程、国际投融资机制倡议。2013年中国倡导构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成为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中国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从根本上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不利格局，进而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的开放新格局。不仅如此，“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锁定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为沿线国家提供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提供助力。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上，中国政府设立的“丝路基金”2015年1月6日正式运营，首个项目于当年4月落户巴基斯坦；中国与金砖国家合作推动建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已于2015年7月21日正式开业，有效缓解了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所遭遇的“融资难”问题；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全球迎来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此前，在2014年北京APEC峰会上，中国提议建立的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得到了APEC成员的支持。这些战略构想和举措的提出与付诸实施，意味着中国将不再仅仅是国际经济体系及规则的参与者，而正在努力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建构者和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已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宏大的“以我为主”的地缘经济战略布局。

时　评

『旋风外交』成效显著

□丁工

9月20日至22日，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总部举行系列会议，李克强总理首度亮相联合国、登临大讲坛，全程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一场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的外交“世界杯”，一场同联合国序列里16家国际组织和直属机构“掌门人”聚首的高峰“碰头会”，两场解决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主题的“重头戏”，以及见缝插针式的出席数场高级别外事活动，由此足见总理的联合国“日程表”被安排得满满当当，高效务实的“中国方案”、成效显著的“旋风外交”迅速席卷联合国。由于今年恰逢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45周年，再加上中国刚刚举办完G20大型国际会议，故而本次李克强总理“首秀”联大之旅可谓看点极多、意义非凡。

“中国担当”新起点、再出发。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成就辉煌、贡献卓著。当今世界还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或者国家集团能够取代联合国的地位，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宗旨和基本原则依然是适用于世界各国的共同价值和共通理念。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自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和突出建设者，也是《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的积极践行者和坚定守护者。目前，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官兵人数最多的国家，也是第二大维和行动摊款出资国和第三大会费缴纳国。李克强总理亲赴纽约参加联合国系列活动，既是今年中国多边外交领域的一项重大任务，对推进中国与联合国围绕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维护集体安全机制、强化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等议题开展合作具有特别意义；也充分表明中国对联合国工作及多边主义机制的支持和重视，从而极大体现世界责任与国际道义的“中国担当”。

“中国行动”重信义、守承诺。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参加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时，提出多项支持联合国的庄严承诺和实质举措，宣布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专项基金”，开创中国与联合国协同推进全球接续增长、人类永续发展的新语态和新意境。因为“说易做难”，所以“行胜于言”。在今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同努力改造我们的世界——中国主张”的专题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就上述政策措施后续兑现和承接落实的相关情况，向与会各方做出了详细介绍和细致说明，他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批准并将适时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这是世界首份按目标、分领域列出的施行路线，也是中国落实可持续发展议项的行动指南。中国率先推出“国别方案”的要览和总纲，既向国际社会传递中方愿与各国一道同心协力推进政策落地、措施就位的决心和信心，也向世界人民展现中国信守诺言履行契约的气度和风范。

“中国情怀”济天下、惠众生。本轮难移民高层级会议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召开以应对难民和移民问题为脚本依归的高级别专办会议，同时也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此种场合阐述关于难移民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当前难民和移民社群事件大规模出现，不仅给相关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带来冲击，也严重拖累世界经济复苏与地区和平稳定，还给恐怖主义带来可乘之机，从而引发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问题，被专门工作组列入最难解命题的“任务”清单之上。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难民和移民问题是一场人道主义危机，考问着人类社会的良知，保障难民的生存权利和基本尊严既是责任和道义使然，也是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所在。中国向来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解决难民和移民问题，即使在过去贫穷困难的时候也从不缺席、回避相关事务，在本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代表中国宣布三项应对难移民问题的实策硬招，赢得国际舆论的一致赞誉和广泛好评。

“中国经验”齐受益、共分享。中国从一个贫弱穷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励志故事”和发展经验，致力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韧劲耐性，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之路具有很强的借鉴参照价值。通过改革创新释放发展动力、体制活力，既是中国力量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影响世界格局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方式。中国以立足自身体制机制改革和倡导创新增长为依归基准，倾向于而不是寄托于全球多边发展机构和世界经济组织的先进治理理念和经济发展模式，既贴近实际又方便可行、既造福本国人民又助益他国发展，对大多数仍然处于道路探索实践和纠偏试错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适用性强、参照度高的选择路径和有益尝试。中国始终秉承和谐共生的理念并保持着开放包容的心胸，愿与世界各国共同分享带领民众脱离贫困的成功经验和发展机遇，愿向他国提供克服经济困局、实现繁荣昌盛的宝贵经验和有效方法。



欧元的挑战与前景

□ 胡　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就一直处于不断的动荡之中，经济衰退、欧债危机、英国退欧以及最近热议的欧洲银行业困境，让人不禁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充满忧虑。而作为欧洲一体化的重大成就——欧元，是否会消亡，也正在成为外界持续关注的话题。

欧元诞生之路

上世纪30年代，世界各国为保护本国产业，随意操纵汇率，竞争性贬值成为贸易政策常态工具，自由贸易受到严重损害，从而导致世界经济解体，引发世界大战。因此，建立一个汇率相互挂钩并稳定，且国际资本可自由流动的金融架构成为必然选择。在这一理念推动下，基于美元—黄金本位制，以美元为国际清算支付手段和主要储备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欧洲各国货币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进程也就此开启。

1960年代，随着欧洲内部国际资本流动不断加剧，欧洲货币制度日益面临“蒙代尔三元悖论”的挑战，即汇率稳定、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及资本自由流动这三项目标不可同时实现。具体来说，在资本进（出）一国时，该国要确保汇率稳定，就得履行干预义务，从而承受通胀（通缩）压力；而如要保证国内价格稳定，则会导致本国货币对外升值（贬值）。鉴于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与共同市场原则毫不相容，随着资本流动的逐渐自由化，欧洲要坚持各国货币自主权，就要忍受浮动汇率下区域内部剧烈的汇率波动；否则各国就要放弃货币自主权，建立汇率永久固定的货币联盟。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之下，欧洲各国普遍认为欧洲内部稳定的汇率是共同市场运作的必要条件，因此，建立货币联盟，即货币的一体化成为经济逻辑下的必然选择。

而这种选择，也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先天制度缺陷而凸显其现实迫切性。一方面，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须保证币值稳定，以维持各国对美元的信心，另一方面，美国却又需要通过国际收支赤字来为国际清偿提供足够的美元；这一所谓“特里芬两难”问题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动荡与瓦解。1960年代末期始，欧洲各国深受美元的干预义务和通胀压力频繁调整货币平价之害，剧烈的汇率波动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极大冲击。在这一背景下，货币联盟被提上议事日程。

先天不足

然而，货币联盟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其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共同货币管理机构（如欧央行）、货币完全可兑换（即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和汇率永久固定（可保留本国货币，也可引入统一货币如欧元）。货币联盟内的各国，如宏观经济条件与经济结构存在差异，其在面对各类经济冲击时，受到冲击的影响亦会不同，从而无法采取共同政策予以应对；而永久固定汇率意味着，各国面对不对称冲击时，又不掌握汇率政策这一工具，如果不能通过其他调节机制，比如区域内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的高度流动性、统一的财政政策或灵活的工资与价格制度，来吸收非对称冲击，那么货币联盟内部就会出现成本巨大的失衡，即大相径庭的价格或收入变化。具体来说，在保留本国货币的货币联盟中，外部冲击会在区域内产生可观的通胀差异；而在使用统一货币的货币联盟中，则会导致各国经济增长与就业水平的结构性失衡。因此，货币联盟的建立，须尽量符合“最优货币区”的要求：要不各国宏观经济条件和经济结构趋同，使得冲击分布对称；要不就在劳动力流动、财政政策、工资与价格制度方面具备替代独立货币政策、平抑不对称冲击的灵活调节机制。

> **在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制度改革仍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引进更具刚性的财政约束与转移支付机制，甚至财政联盟，以平抑各种原因产生的不对称冲击，从而完善“最优货币区”，稳定货币联盟，应该是决定欧元区未来成败的关键任务。**

此外，因德国联邦银行的高度信用，各国货币盯住德国马克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应对通胀的压力，德国马克也因此成为大多数国家事实上的准锚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保留本国货币的货币联盟，欧洲货币联盟极有可能成为德国货币政策主导的“德国马克区”。一方面，从法律和经济层面来看，德国联邦银行无法胜任这一角色；另一方面，欧洲其他大国（尤其是法国）在政治上肯定也无法接受，因此，引入共同货币是货币联盟的必然选项。

尽管当时许多研究结果表明，欧洲仍未达到最优货币区的要求，从经济角度来说仍不具备建立货币联盟的条件，但国际政治形势的巨变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为了打消法国对强大的统一德国的顾虑，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同意放弃德国马克，引入共同货币，与法国一起推动欧洲一体化；作为交换，法国将在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与德国建立更紧密的政治联盟。最终，在强大的政治意愿下，统一的货币欧元和统一的货币管理机构欧洲中央银行于1999年在欧洲启动，欧洲货币联盟——欧元区最终成立，发展到今天，成员已扩展至19国。

后天失调下的欧元挑战与前景

然而，欧元区更多是政治意愿的产物，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欧元区并不符合最优货币区的要求，仍不具备建立货币同盟的充分条件。这是因为，一方面各国宏观经济条件与经济结构始终千差万别；另一方面引入共同货币后，成员国失去了汇率政策这一调节竞争力的重要工具，相应的替代性机制（例如统一的财政政策、充分流动的劳动力市场或灵活的工资与价格政策等）却迟迟未能建立起来，整个欧元区宏观经济面临巨大的失衡风险。这一风险从欧元产生以来就一直在积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主要表现为竞争力分化导致的区域内部国际收支严重失衡；而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失衡愈演愈烈，并扩散到经济增长、消费、就业、公共财政和金融市场等各个领域，最终演变为银行业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恶性循环，导致欧元区损失惨重。

尽管在各种救助机制下，危机暂时得到了控制，但欧元区非“最优货币区”这一危机根源如果得不到消除，失衡及其引发的危机迟早还会再次出现，欧元及欧元区将不断处于动荡之中，就此而言，尽快完善相应的制度建设不可或缺。在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制度改革仍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引进更具刚性的财政约束与转移支付机制，甚至财政联盟，以平抑各种原因产生的不对称冲击，从而完善“最优货币区”，稳定货币联盟，应该是决定欧元区未来成败的关键任务。

世界经济